

# 关于内藤文库所藏钞本《章氏遗书》来历之考证

〔日〕陶德民

**摘要：**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是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的镇库之宝。内藤湖南1902年初读《文史通义》，1919年购入此善本后据以做成《章实斋先生年谱》，次年发表于京都《支那学》杂志，不仅刺激了北京大学胡适撰成同名年谱赠与内藤，也获得了张尔田的激赏。清华大学姚名达更两次致函内藤，希望其念及与去世不久的王国维的情谊而允诺借阅，以便对照校勘以实现纂成新编《章氏遗书》的宏愿。本文对此精钞本的来龙去脉及其引起的一连串文化交涉做了详细考证。

**关键词：**钞本 《章氏遗书》 内藤湖南 胡适 文化交涉

关西大学的前身为1886年（明治19年）创立于大阪市内的“关西法律学校”。1986年百年校庆时，作为纪念事业的主要举措，在兴建庄严雄伟的百年纪念馆和综合图书馆的同时，购入了价值连城的内藤文库与内藤晚年居住的恭仁山庄，而钞本《章氏遗书》可以说是其中的镇库之宝。<sup>①</sup>

① 长期以来，校方、图书馆长、司书和文学部教授致力于引进珍贵文献，形成了一个颇有特色的文库群，其中与儒学和中国相关的文库还有泊园文库（1825年至1948年存立于大阪市内的泊园书院的藏书。泊园是关西大学文科的前身，现任泊园纪念会会长是以朱子学和礼学研究著称的吾妻重二教授），玄武洞文库（师从幕末大阪诸儒并自成一家的田结庄金治收集的数百种孝经版本及相关书籍）、长泽文库（日本的目录学泰斗长泽规矩也的中国文学及书志学相关藏书）、中村幸彦文库（近世日本文学大家的宝库。晚年从九州岛大学退休后执教于关西大学）和增田文库（近现代中国研究者增田涉的藏书。1931年在鲁迅家中单独受业中国文学史达十个月之久，之后又屡获鲁迅寄赠新著。晚年从大阪市立大学转来关西大学执教，1977年在其至交竹内好的追悼会上致完吊辞后即不省人事而逝世，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界连丧双璧的一段痛楚而难忘的记忆）等。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主要为内藤湖南及其长子内藤干吉的藏书和家族信件。内藤原来收藏中的几件国宝级文物，如《唐写本说文残卷》等，为武田制药公司所属的杏雨书屋所藏，还有部分书籍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最近，内藤湖南三子、已故爱知大学教授内藤戊申的藏书也进入该所收藏。关于关西大学文库群的详情，请参见网页 [http://opac.lib.kansai-u.ac.jp/index.php?page\\_id=17216](http://opac.lib.kansai-u.ac.jp/index.php?page_id=17216)。

近年来，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2007年创立、2012年改称文化交涉学研究中心）倡导的东亚文化交涉学，伴随着与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和高丽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等共同创立东亚文化交涉学会（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简称SCIEA），并每年易地轮番召开年会而名闻遐迩。而钞本《章氏遗书》的流传和利用，则可谓近代中日文化交涉史的一段佳话。<sup>①</sup>

前年以91岁高龄去世、有通儒全才之称的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倪德卫（David S. Nivison 1923—2014）在50年前出版的大作《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一书导言的开头部分，曾对这段佳话作过如下叙述。“自从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1902年首次阅读了流传最广的文集《文史通义》和《校讎通义》以后，章已经开始引起中国和日本学者越来越多的兴趣。内藤让他在日本的朋友留意这些作品，并在此后不久得到了一种更完整的章氏作品的手稿，以此为依据，他为章学诚编纂了一个简要的年谱。这发生在1920年。此后，章开始在他的故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1922年，由胡适编纂的一部更为详尽的章学诚年谱以成书的形式出版，同年还出版了第一部基本上完整的章氏遗文集。从那时起，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开始发表文章讨论章的著作和思想的方方面面，或者在有关中国历史和学术的著作中详尽地研究他。”<sup>②</sup>

当时《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筑摩书房，1969年至1976年）尚

① 有关东亚文化交涉学会的历届年会和英文年刊，详见网页 <http://www.sciea.org/>。

②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ueh-Ch'eng (1738—1801)*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倪氏在哈佛师从的中国教员之一洪业先生为之作封面题词“学际天人 才兼文史”以赞颂章学诚。该书荣获同年即1966年的儒莲奖。转引自杨立华的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2007年10月，第2页。引文中画线部分的英语原文为：“Naito called these works to the attention of his friends in Japan and later obtained a manuscript of a larger part of Chang's writings, from which he prepared a brief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the author.”英文原书也为第二页。

未出版，这段叙述所依据的是内藤的《研几小录》（弘文堂，1928年4月）和《支那史学史》（弘文堂，1949年5月），前者收录了1920年11月和12月连载于京都《支那学》杂志第一卷第三、第四号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和1922年5月发表于同一杂志第二卷第九号的《读胡适之的章实斋年谱》，后者收入了内藤1928年10月6日在大阪怀德堂所作的讲演《章学诚的史学》。由于这是倪氏大作中的第一个注释，特别引人瞩目，显示了冷战初期欧美学者利用战前日本积累的研究成果进行中国研究的时代特征。<sup>①</sup>细读这段叙述，可知其对来龙去脉的介绍较为清晰，不过其中“在此后不久得到了一种更完整的章氏作品的手稿”一句，不仅在关于从初读《文史通义》到购入钞本《章氏遗书》相距时间的交代上，而且在对于该钞本性质的理解上，显然是有误解和误译的。

首先，从1902年初读《文史通义》到1919年购入钞本《章氏遗书》，相距时间达17年之久，然而因译者将“later”一词译作“不久”而产生极大误差。据内藤本人上述数文中的记叙，特别是内藤文库所藏该钞本的附属信件，此钞本是1919年4月16日由上海英租界的日系会社“乐善堂书药房”担任中国书籍贩卖的岸田太郎以邮包寄给时在京都帝国大学执教的内藤，信中告知“遵命买下的钞本章学诚遗书”的目次乃是依照王宗炎（晚年的章氏委托其代为校订编辑自己书稿的友人）原定编次，但是故意未将已经刊刻的《文史通义》中之各编抄存其中。太郎在信中要价“二百伍拾圆”，说是“以今日之困难行情，这已是竭力加以讨价还价的结果，如果您万一不要的话，敬请寄回以

① 倪氏于1940年考入哈佛本科后不久即应征入伍，在陆军日语学校学习后从事日军密电码的破译工作，据云在情报部门期间为赖肖尔属下。战后回到哈佛大学也继续接受赖氏以及费正清和杨联升的指导，直至1953年完成关于章学诚的博士论文，1954年马上由富布莱特基金会资助访问京都大学一年，其日文水平应该不错。而众所周知，赖氏作为传教士之子出生于东京，并在日本念完高中才去美国读大学。“二战”期间应征入伍为情报官员，战后回到哈佛，1960年前期出任肯尼迪政府的驻日大使。

便让与他处”<sup>①</sup>。

这17年之久的相距时间，意味着内藤对人物研究所持的谨慎态度，即不以其代表作轻易评判，而是耐心收集相关史料以知人论世，务求立论公允而详实。与内藤的章学诚论相仿的是他的富永仲基论，两者皆经过十几年乃至二十几年的上下求索，等到关键史料出现并把握全体概况，水到渠成之后才作出盖棺定论。<sup>②</sup>

其次，此钞本乃是孙问清以厚酬聘请的秀才们精心抄校的章氏遗书，而不宜以“一种更完整的章氏作品的手稿”相称。先是作者倪德卫用manuscript（手稿）而未用copy（抄本或钞本）一词加以形容，导致包括译者在内的读者有可能误解其或是章氏本人的亲笔手稿。因为手稿一般表明某稿件用手写而成，唯抄本才能确然表明其非章氏手书，而是拷贝。又由于译者没有充分理解（manuscript）之前所加的不定冠

① 见内藤文库所藏钞本《章氏遗书》附属物中的该信件，解读时得到了杉村邦彦先生的指教，谨此志谢。据柴田清继的调查：“岸田太郎は岸田吟香の二番目の弟万三郎の長男である。吟香は1877（明治10）年、精奇水という目薬を販売する楽善堂を東京銀座に開店し、翌年には上海に、さらに1887（明治20）年には汉口にそれぞれ支店を開設した。万三郎の五男完五の息子である岸田準一の回顧するところ（“上海楽善堂の思い出”。《浄世夫彦記念会々誌》6所載）によれば、楽善堂上海店の経営は完五が当たり、太郎は中国書籍の取り次ぎに当たっていた。”《神戸発行〈日華新報〉の基礎的考察—明治大正期の日中両国語新聞—》，<http://mker.jp/archive/041014.html>。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百五十拾圆”可谓价格不菲，可以由当时书画古董市场的行情推知。例如，旧拓颜真卿《争座位帖》值三百金，张照（1691—1745）《论律法疏草册》值三百六十金，王文治（1730—1802）《临二王书册》值百三十五金，姚姬传（1731—1815）《秋夜七绝草书》值二百金。据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员富田淳：《槐安居コレクションと聴氷閣コレクション—高島菊次郎氏と三井高堅氏—》，收入关西中国书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關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来》，2012年3月。我也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作了报告，收入该报告书的论文题为《大正期中国书画蒐集の指南役としての内藤湖南—その眼識と実践—》。

② 陶德民：《从中日近世学术寻求〈与西欧神理相似者〉——内藤湖南的章学诚研究对张尔田和胡适等的影响》，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视域中中国人文学术的传统与近代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2016年8月24日。相关论文参见《内藤湖南の章實齋顕彰に刺激された中国の学者——胡適、姚名達および張爾田との交流について》、收入陶德民：《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中国学の始まり—漢字の革新と同時代—》，关西大学出版社，预定2017年3月出版；《内藤湖南の仲基研究》、收入陶德民：《日本漢学思想史論考—徂徠・仲基および近代—》，关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叢刊十一，大阪：关西大学出版社，1999年。

词(a)的妙处,而将误解铸成了误译。因为倪氏使用这个不定冠词,原本是想达到将“是否章氏亲笔手稿”的问题加以模糊化的目的,从而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避免做出确定判断。

内藤湖南1919年从上海乐善堂书药房购入的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的由来,可以从参与抄写的金兴祥的以下感言得知。金氏是在中日之间从事文物买卖的古董商,曾数次造访京都市内的内藤家。为投其所好,1921年曾将自己和友人抄写的章学诚未刊稿三十一篇汇成两册进呈内藤,扉页上有其题词“辛酉重阳后十日寄赠湖南先生秀水金兴祥”。后来又当面赠送“小松司马书画合锦条幅”,卷轴上的题签为“湖南先生清赏金兴祥持赠”。<sup>①</sup>1922(壬戌)年3月,金氏在内藤家中看到成于二十余年前的这个钞本时,不由得情动于中,感慨万千。因内藤相劝,当场在其中自己负责抄写的第九册最后一页写下感言。

丙申年秋季 诸暨孙问清太史廷翰 以章实  
斋先生文稿嘱钞录一册 今年春三月  
内藤湖南先生出以见视 始知此全书  
归于 先生邗架 时隔二十五年不胜沧桑  
之感 特识 岁月壬戌三月 秀水金兴祥

该页栏外,还有内藤关于当时谈话的亲笔记录:“孙问清为诂经精舍高材生金颂清云。”之前的一页有“是册托秀水金吉石之世兄颂清所抄丁酉八日校”一行,为总管全书抄校事宜者所写,其中“颂清”二字处原为空格,以淡墨补书此二字的似为内藤笔迹。空格之原因,估计是总其事者书写时未能记起金兴祥的名号。与其他各册末尾中的类似注记联系起来,可见该书十八册抄写校对完毕,是在1897(丁酉)

<sup>①</sup> 陶德民:《内藤湖南と清人书画——関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品集》,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9年,91页。合锦条幅中的画上有“邹县孟庙外两槐甚古嘉庆元季十一月图之钱塘黄易”之落款。小松为章学诚的同时代人黄易(1744—1802)的号,司马之称乃是因其曾任山东运河同知之故。

年2月。

金兴祥（1878—1941），名颂清，金尔珍（吉石）之子，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少习儒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补博士弟子员。后致力于经史之学，对图书文物的研究有较高造诣，善鉴真伪。<sup>①</sup>“丙申”为1896年，当时金氏19岁。其父金尔珍以从事毛晋“汲古阁”古籍善本的影印而闻名遐迩，金氏本人自小受到良好熏陶和教育，虽然3年后的1899年才补博士弟子员，此时已开始崭露头角，所以会受邀参与此书的抄写和校订，总其事者称之为“金吉石之世兄”，可见周围士人对他的器重。而金氏也不负众望，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动荡岁月中转而经商，1920年代在上海开办中国书店，1936年曾在东京开办古董展览，现今日本收藏的不少书画精品均是所谓“金氏携来品”或“金颂清氏将来品”。而金氏也有孝心，于1924年将其亡父金尔珍的墨迹汇集出版了《梅花草堂临书》。<sup>②</sup>

感言中提及“以章实斋先生文稿嘱钞录一册”的“孙问清太史”为浙江诸暨人，生于1861年11月12日，卒于1918年2月27日。其谱名为起焕，更名廷翰。号文卿，又号问清。廩膳生，光绪乙酉（1885）科本省乡试举人，己丑（1889）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编书处纂修和文渊阁校理。据《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人物小志》记载，孙氏“沈潜好学，未尝鸞声气、事标榜。日购求善本，前后费万数千金，购古人书画费三万余金。沪上书贾，尽出其门，廷翰日夕披览无倦色。庚子英法联军攻北京，图籍彝器多毁，其中《二十四史》尤称善本。廷翰时方在馆，百计谋之，得版权，影印1000册，捐入北京大学20册，其余图书馆、学校复若干

① 据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item/%E9%87%91%E9%A2%82%E6%B8%85/5043879?fr=aladdin>。

② 金尔珍（1840—1917），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字吉石，号少芝（之），又号苏龠，室名梅花草堂（有《梅花草堂诗》），例贡生。工书画，精鉴赏。书法钟王，尤喜学苏，画山水有宋元风格。亦嗜金石，善刻印。据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关于“金氏携来品”，参见前注的富田淳论文。

册，竟以是耗其产。汤寿潜总办沪杭甬铁道，廷翰为董事，其后浙江旅沪公学复推为校长，率以循谨称。楼藜然（号蓄庵）创设诸暨图书馆，廷翰先捐书数千卷”。《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诸暨社会现象》还有“孙问清太史寓居沪上，购求古书数万卷。太史既歿，书随散佚”一段。<sup>①</sup>可见孙氏1918年去世以后，其藏书通过其家人之手流入市场。其中一些贵重古籍为嘉业堂主人刘承幹（1881—1963，号翰怡。即倪氏所说在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问世同年出版了“第一部基本上完整的章氏遗文集”的刘氏）等收购，而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则为上海乐善堂书药房岸田太郎买下，之后又为内藤湖南于1919年春天购入，在时间顺序上是完全吻合的。

在时间顺序上完全吻合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孙问清之所以在1896“丙申年秋季”“以章实斋先生文稿嘱钞录一册”，是因为家居沪上的他于五年前的1891（光绪17）年12月31日（阴历12月1日），在章学诚族裔章小雅的海寓所见过其所藏的《章实斋先生遗书》抄本34册。当时孙氏31岁，两年前中了进士，可谓新贵。陪同他造访章小雅府上的晚清文献学家萧穆（1834—1904）比他大27岁，是海上闻人。幸而萧氏在其《敬孚类稿》卷九《记章氏遗书》留下了这次私家访书的记录，使我们得以了解孙问清与《章实斋先生遗书》的因缘。

光绪十七年辛卯冬，晤章氏族裔章小雅处士善庆于上海寓所，小雅好古，藏书颇多。十二月朔日，同诸暨孙问清太史廷翰往访小雅，观所藏各古书善本。中有旧钞章实斋先生遗书三十四册，云为其乡人沈霞西家藏本。沈氏藏书数万卷，约直四万金，后其人亡家落，多散之扬州等处。此遗书乃留落绍兴本城某书坊，以

<sup>①</sup> 1980年代任诸暨市图书馆长并参与编辑《诸暨县志》的杨士安先生，于2012年撰有《孙廷翰简介》一文，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731674010143j4.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731674010143j4.html)。

洋银百元得之。<sup>①</sup>

文中的沈霞西（1779—1850），名复粲，号鸣野山房主人，是章小雅的绍兴同乡和前辈，闻名遐迩的大藏书家。又据沈霞西族裔沈知方（1882—1940）《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子部·杂家·信摭”记载，沈氏还从章学诚长子章杼思处借抄过章氏所著《信摭》，书末有其跋语，曰：“此册实斋先生57岁以后所记。起乾隆甲寅至乙卯冬竟。复粲于道光戊子夏从其嗣子杼思处借钞。”<sup>②</sup>因而可以推知，孙问清嘱抄的章氏遗书的底本，可能就是他所见过的章小雅购得的沈霞西原藏本。因博学多识的萧穆称之为“旧钞”本，可见也不是章学诚的手稿本。不过，因为章学诚去世时，沈霞西已有23岁，且与章氏长子有借抄章氏遗文等交往经历，他的钞本应该也是比较接近章学诚手稿原貌的善本。<sup>③</sup>

上文提到的刘承幹所刻嘉业堂本《章氏遗书》（1922年），出版以后好评如潮，其底本则是1917年从德高望重的沈曾植（1850—1922）处借来的。刘承幹《求恕斋日记》1917年8月22日（阳历十月七日）关于当天午后的造访有如下记载：

- ① 《萧穆论章氏遗书》，《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624—625页。参见潘建国：《沈复粲鸣野山房藏书考略》，《文献季刊》，2008年10月第4期。
- ② 转引自潘建国：《沈复粲鸣野山房藏书考略》。关于近代出版界的名人沈知方，近有安徽大学硕士论文《沈知方时期世界书局出版活动特色探析》（2009年）加以探讨，作者殷航经与沈氏侄子沈嘉华联系，得以推定其卒年。从该论文所引沈知方《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序言来看，鸣野山房之称似乎并非始自沈霞西，只是在沈霞西时达到巅峰而已。所谓“家本世儒，有声士林；先世鸣野山房所藏，在嘉道关已流誉东南；霞西公三昆季，藏书之富，尤冠吴越”。
- ③ 据《萧穆论章氏遗书》即《敬孚类稿》卷九《记章氏遗书》，两人访书后，萧穆曾借阅该钞本并录其要者四、五册。而章小雅于次年即壬辰（1892）年9月21日便逝世了，其所购旧钞章实斋先生遗书归于其兄章石卿（寿康）。寿康因缺用曾将该旧钞本和托人录下的副本质于书肆醉六堂。因听闻醉六堂主人吴申甫将出售其书，萧穆费尽周折，从友人周莱仙处借款将副本赎出，并从吴申甫借出旧钞本，从而完成了校对作业，并拟募资速刊，但是终未实现。不过，其保护和彰显章学诚遗书的功劳极大，令人起敬。因此，孙问清嘱钞的底本为章小雅、萧穆这一系统的版本，可能性极大。



与孙益庵同至沈子培处，谈至晚而归。伊藏有《章实斋全集》稿本，较《文史通义》多出数倍，向未刻过。实斋著述此为最足，益庵劝予刻以行世，予允之。今见子培，伊谓：“此书予向极宝贵，从不假人，今阁下可刊，尽可取去，予不禁为实斋庆也。”<sup>①</sup>

将珍藏的《章实斋全集》稿本借给刘承幹的沈曾植，字子培，浙江嘉兴人，与金兴祥是同乡，与金氏之父金尔珍是同时代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以及上海南洋公学监督。一生藏书颇富，先后积书达30万卷，精本亦多，宋槧元刊近百种，方志和乡邦文献百余种，康熙、乾隆刻本为最富，藏书库有“海日楼”等数处。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以及内藤湖南与之长谈后均为其折服，卡氏更著《中国大儒沈子培》一书加以颂扬。沈氏1922年去世后，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在其挽联中称之为“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sup>②</sup>。笔者曾在相关论文中提到，内藤于1899年初次访华时已闻得沈曾植大名，1902年11月15日与沈氏作竟日长谈后，一再向沈氏请求其《蒙古源流笺证》的抄本，并推测内藤之购入《文史通义》并加以精读可能与沈氏的推荐有关。

陪同刘承幹求借沈曾植藏《章实斋全集》稿本并极力怂恿其刊行之的孙益庵（1869—1935），名德谦，晚号隘堪居士，江苏吴县人。张尔田（1874—1945）晚年的燕京大学国学院同事和至交邓之诚在所撰《张君孟劬别传》曾提及，张尔田“居上海时，与海宁王国维、吴孙德谦齐名交好，时人目为海上三子。国维颇有创见，然好趋时；德谦只辞碎义，篇幅自窘，二子者博雅皆不如君”。1915年前后，沈曾植主

①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455页。

② 沈曾植，参见百度百科网页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2%88%E6%9B%BE%E6%A4%8D/119017?fr=aladdin>。王国维挽联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之自序。

持编纂《浙江通志》时，邀请王国维、张尔田等为分纂者。沈曾植于1922年逝世后，张尔田哀其身后遗书零落，便发愤为其校补《蒙古源流笺证》，积十年之功，订正百数十事，终于1932年将其刊行，并赠送内藤一本。内藤文库中至今保存着这部“沈曾植撰张尔田校补”的大作，当时张氏寄赠时的来信，以及经手者、中国银行大阪支店长戴克谐氏的书简。<sup>①</sup>

刘承幹在出版嘉业堂本《章氏遗书》（简称“刘刻”）时，孙益庵和张尔田都应邀撰写了序言，孙益庵还指导了校勘工作。梁启超的高足、对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作了订补的姚名达在新版年谱中把“刘刻”和胡适所作章氏年谱的同年出版作为章氏研究史上的两件大事：

生平学术始显于世民国一十一春（一九二二）（卒后一百二十一年）

章氏遗书刘刻行世民国一十一秋（一九二二）（卒后一百二十一年）<sup>②</sup>

姚氏还对其订补工作所依据的数种《章氏遗书》刊本和杂志所载章氏文献作了如下交代和评论。

1. 会稽徐氏钞本，即浙江图书馆排印本。这本的好处是目录下有注。

2. 山阴何氏钞本，即杨见心先生藏本，即马夷初先生转钞本，即

① 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数据编辑部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参见陶德民：《内藤湖南における進歩史観の形成——章学诚〈文史通義〉への共鸣》，《アジア游学》第93号，2006年11月。《关于张尔田的信函及〈临江仙〉词——内藤文库所收未刊书信考证（二）》，关西大学《中国文学會紀要》第二十八号，2007年3月。从遍布内藤手泽本《文史通义》、特别时其中的“言公”篇的朱色眉批来看，可以了解到他当初读此书时的欣喜心情和钻研精神。

②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年“大事索引”，第3页。其中括号中的公历年份，为笔者所补。

杭州日报中国学报印本。这本的好处是编次最有条理。

3. 刘翰怡先生刻本，据说是据王宗炎所编，沈会植所藏的钞本，加上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和州志、永清志、湖北志稿和几种札记，这本的好处是收罗得最丰富。

4. 纪年经纬考。

5. 此外散见于国粹学报、古学汇刊、禹域丛书、艺海珠尘及其他丛书或杂志的遗文，也曾参考，不必详举了。<sup>①</sup>

但是，当姚氏试图在补订年谱的同时校勘出一部最为可信的《章氏遗书》文本时，他终不免落入找不到一个钞本的窘境而有如下遗憾：“刘刻虽博，亦不及广征别本。我随便拿别本来校，除了抄胥手民因形似音近而致误的文字以外，整段的多寡，整句的异同，两皆可通的文字，就不知有多少，几乎没有一篇全同的。因此我又化了好些工夫，去校勘章氏遗书，不管是单行本，丛书本，杂志本，只要在北京能找出的，我都找来校过了。北京虽是书籍集中的所在，但我所要找的章氏遗书钞本一本也不曾看到。（民国）十七年六月中我做章实斋著述考，考到了文史通义，便不能不搁笔。八九月里，所以远渡东海，浪游两浙，不恤金钱和时间，不畏危险和辛苦的缘故，只是要找几个钞本看。”<sup>②</sup>

其实，内藤文库中保存着姚氏写于1928年1月11日的信函，其中有如下感言和请求，可见他在半年多以前已经下定决心东渡日本，以便目睹内藤所藏的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并据以校勘章氏遗书。信的后半部分如下：

名达学习 大邦文字过迟 近始能读  
大著 既感  
先生治学之勤 益我之厚 又知

<sup>①</sup>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大事索引”，9页。

<sup>②</sup> 同上书，4页。

先生先我而作史学史也 佩仰之至 三年前立斯志 不  
图遥与海东 先辈暗合 拟俟  
大著出版 当遂翻之 即祈  
阅校 以饷弊国后学 其功效当较拙著尤大  
耳 名达校读章学诚先生之书于今三年 尚欲  
敬求  
宝藏章氏遗书抄本一校 并思得京都某店  
朱少白自笔文稿一读 不知  
先生能慨助之乎 抑俟四月来莅遂携示乎 近来  
大著有关于章先生者否 拙著章实斋之史学正  
在起草 敬祈  
多赐教言 俾免误解 拙著之已成者甚愿寄呈  
请教 在今日弊国 欲得一学精路同之先辈如  
先生者 上天下地不可得也 故孺慕心仰于  
先生为特深焉 临启神驰 伫候明教  
内藤湖南先生玉案下 后学姚名达拜启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 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

姚氏结果是否看到内藤的“宝藏章氏遗书抄本”，已难以核实。内藤文库中的这封信中又姚氏的名片，是随信附来的还是访问内藤时面交的，也无从了解。不过，他和胡适一样，把自己订补的胡适章氏年谱寄赠一本给了内藤。

钞本，特别是内藤所藏的这个钞本十八册之所以珍贵，如前所述，不仅是因为其底本是与章学诚长子有交往并借抄过章氏遗文的沈霞西原藏本（后为章小雅购得），而且是因为世居上海、家财万贯的孙问清以厚酬聘请的秀才们精心抄校他自己亲眼见过的这个钞本。据曾任诸暨市图书馆馆长并参与编辑《诸暨县志》的杨士安记述，“咸丰八年（1858）‘粤匪’窜入浙境，诸暨被蹂躏，廷翰之大父鄂生（1812—

1886，即孙维棣）时方治沙船业，出入海上，遂移家上海居焉。父恕斋（1839—1911，即孙光圻）与仲兄子方（1837—1896，即孙光坊）相友爱，联屋而居，生五子，廷翰其长也。”“问清既显贵（指其高中进士——笔者注），而恕斋益以商业致饶，给世俗所谓富与贵者，问清以年少兼之，宜无不自得者。”<sup>①</sup>因此，为得一套精钞精校的《章氏遗书》，孙问清是不会在意多付一些酬金的。

遍观十八册中的相关注记，可知此钞本的抄写和校对作业大多是总其事者委托其所信任且有“茂才”（即秀才）身份的士人承担的，同时也包括金兴祥这样年龄未滿二十的前途有望者（三年后“补博士弟子员”）。聘请他们来做，所付的酬金自然要多，但可以保证抄校的质量和可信度。与此相反，若雇用只识汉字而不谙儒学的“抄胥手民”来做的话，费用可以节省，但抄写时不免会“因形似音近而致误”。姚名达所言极是也。

姚氏的态度，可以说是继承了胡适做章氏年谱时的态度。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支那学卷一，第三至第四号）。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一位专讲史学的人，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

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我读了内藤先生作的年谱，知道他藏有一部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替我把这部遗书的目录全钞了寄来。那时我本想设法借这部遗书，忽然听说浙江图书馆已把一部钞本的章氏遗书排印出来了。我把这部遗书读完之后，知道内藤先生用的年谱材料大概都在这本书里面，我就随时在内藤谱

<sup>①</sup> 杨士安《孙廷翰简介》文中引用《光绪诸暨县志·坊宅志》：“孙翰林故里，在北门街，光绪己丑进士翰林院检讨孙廷翰祖居。”

上注出每条的出处。有时偶然校出内藤谱得遗漏处，或错误处，我也随手注在上面。我那时不过想做一部内藤谱的“疏证”。后来我又在别处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记在一处。批注太多了，原书竟写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个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谱。这便是我作这部年谱的缘起。

可见在当时《章氏遗书》尚无刊本时，胡适也竭力想读到内藤所藏的这个钞本，不仅托人钞来目录，而且想目睹其书。好在年谱撰写途中，浙江图书馆出了排印本，才打消了借阅的念头。如前所述，在其年谱出版半年之后，刘承幹的吴兴南浔嘉业堂刻本也出版了。那时真是一个章氏研究成为显学的时代。

关于内藤和张尔田的交往，需要提到后者的成名作《史微》八卷。邓之诚对此曾作过如下评价，即“本章学诚之旨，求证于群经诸子，穷源竟委，合异析同，以推古作者之意，视学诚为通类，知方灿然有序，君由是显名。倭人至列为大学研文史者必读之书”<sup>①</sup>。而这一推介，乃出于内藤。内藤因激赏《史微》而屡屡向其弟子门生推奖张氏，内藤文库中至今保存有数种不同版本的《史微》。<sup>②</sup>吉川幸次郎记得内藤称张氏为自己的“平生第一知己”，神田喜一郎也回忆说，1926年内藤在与羽田亨编辑《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时因疏忽而未向张尔田约稿，感到颇为遗憾。之后特意拜托，遂将其《真诰跋》一文收入1930年由西田直二郎编辑出版的《内藤博士颂寿纪念史学论丛》。在收到此书后，张尔田在回函中写下如下谢辞。<sup>③</sup>

① 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

② 《史微内篇》四卷本，为《多伽罗香馆丛书第一种》，目录末尾有出版缘起，为“辛亥季春山阴平毅劬刚”所记，劬刚称张尔田为“姨丈”；八卷本，也为《多伽罗香馆丛书第一种》，目录末尾也有出版缘起，为“壬子先立夏三日东荪”所记，东荪称张尔田为“兄”。可见二者都是张尔田的亲戚。

③ 《内藤湖南博士》、东方学会编：《東方學回想Ⅰ·先学を語る（1）》，东京：刀水书房，2000年，第96—97页。参见陶德民：《内藤湖南における進歩史観の形成——章学誠〈文史通義〉への共鳴》，《アジア遊学》，第93号，2006年11月。

湖南先生有道 一昨由弘文堂寄到承赐史学  
论丛、华甲寿言各书，并书示嘉章，祇领感  
谢。区々不腆之文。荷  
先生奖纳，汗颜无地。惟益祝  
先生神明湛固，永为吾党泰斗耳。田年二十余与  
孙隘堪同学，得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好之。彼时  
国内学者颇无有人注意及之者，而岂知  
先生于三十年前在海外已提唱此学，且于竹汀、东  
原诸家，无不博采兼收。覃及域外，较诸实斋  
更精更大。即以文艺论渊雅道逸，亦远在北宋之  
上。此非田一人之私言，实天下之公言也。<sup>①</sup>

此处再录张尔田1934年所写的七律诗《敬挽内藤湖南先生》一首，以资纪念内藤诞辰一百五十年。诗中把内藤和八年前（实为七年又二十四天）逝世的王国维一并视为当代东方文献学的两大家而认为后来恐无来者，虽有过誉之处，确也是基于东亚视野的一个重要看法。

频年问讯到东邻，缟纈西洲有几人？君赠诗有“一时缟纈遍西洲”句

耆旧凋零三岛尽，黄农绵邈百家陈。  
论文久失方闻友，易箴惊传老病身。  
莫怪襄翁双泪眼，观堂宿草墓门春。  
静安歿已八年，君又继之，东方文献之寄无人矣，故末句及

<sup>①</sup> 参见陶德民：《关于张尔田的信函及〈临江仙〉词——内藤文库所收未刊书信考证（二）》，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28号，2007年3月。又及，从遍布内藤手泽本《文史通义》、特别时其中的“言公”篇的朱色眉批来看，可以了解到他当初读此书时的欣喜心情和钻研精神。

焉，非独哭其私也。

敬挽 内藤湖南先生

张尔田稿奉<sup>①</sup>

又及，关于倪德卫在其大作中曾将其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和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 Vico 1668—1744）相比的章学诚，战后的京都学派东亚史学者在研究方面又有新的推进。1989年，即关西大学购入内藤文库后不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便将堪称其镇库之宝的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缩印了一套。<sup>②</sup>研究成果方面，已经刊行的有山口久和《章学诚の知识论》（创文社，1998年），井上进《明清学术变迁史》收录的《六经皆史说の系谱》（原载小野和子编《明末清初の社会と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等。该所于2015年4月又启动了一项三年研究计划，课题名称为“《文史通义》研究”，旨在通过会读，从文献学、史学、文学和思想史等方面作深入探讨，并对其中的内篇加以详细译注，刊载于该所的《东方学报》。研究班负责人为古胜隆一，成员有井波陵一（所长）、岩井茂树、永田知之、藤井律之、土口史记和小林隆道等，可谓人才济济，成果可期，令人鼓舞。<sup>③</sup>

2016年12月31日定稿

[后记] 本文的草成，乃是因为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先生的好意。黄先生拟在近期内将内藤文库所藏钞本《章氏

① 钱婉约、陶德民编：《内藤湖南汉诗酬唱墨迹辑释——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藏品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122—123页。内藤卒于1934年6月26日，王国维卒于1927年6月2日，故曰实为七年又二十四天。

② 《章氏遗书三十卷》，索书号为京大人文研“东方叢-VI-6-25-A-1”。书志信息见日本全国汉籍数据库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019705/taggedCard/8706482.dat&back=1>。此影印本仅制作了一套，装订为六册。是以A4纸涵盖左右两页，尺寸较小。且是黑白的，未将内藤的墨色评点和朱批以原样呈现。这些不足都将在本书中得到改善和克服，值得庆贺。

③ 参见该所相关网页 <http://www.zinbun.kyoto-u.ac.jp/kyodokenkyu/bunshitsugi.htm>。



遗书》十八册加以套色景印，分作四卷，作为该院《东亚儒学资料丛书》的一种。文章原来题为《钞本〈章氏遗书〉景印弁言》，加以修正后，现改为《关于内藤文库所藏钞本〈章氏遗书〉来历之考证》。谨此致谢。

2017年1月31日

